

老墙门里迎春节

蒋静波



当旧年历只剩下薄薄的几页时，春节已款款向我们走来了。我的思念就像长了翅膀，飞过岁月的阻隔，飞到了童年时 在老墙门内过年前后的那段美好时光。

那时，人们的生活虽然过得拮据，但对置办年货却一点也不马虎。为了能买到价廉物美的年货，墙门内的人们三五成群结伴去赶周边的集市。父亲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不断地从集市上驮回猪肉、带鱼、香瓜子之类的食品。除夕越近，过年的气氛就越发浓郁。当墙门里传来杀鸡宰鹅声时，我和两个妹妹闻声飞奔而出，央求主人把大白鹅或花公鸡的羽毛送给我们做毽子。家家门前房顶上都悬挂着好几只吊钩，人们习惯把褪了毛的鸡鸭和鱼肉挂在吊钩上，因此谁家准备了什么年货，只要从他家门口经过就一目了然。

腊月廿三，是家家户户举行祭灶仪式的日子。母亲把祭灶果恭恭敬敬地供在灶上的灶君菩萨像前，祈求全家平安。听说，灶君菩萨一年到头照管着千家万户挺辛苦，只有这天他才离开人间去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

人的善恶行径，人们希望灶君菩萨吃了祭果后，向玉皇大帝说些好话，玉皇一高兴，全家就会有好运。但对我们姐妹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祭果，盼望着尽快供完灶君菩萨，我们就可分享那好看又好吃的红果白果了。

好似一声令下，紧接着墙门内家家户户开始掸尘、脱木窗、卸帐子、拆被子、扛门板……在弄堂通往河埠头的那条石板路上，人来人往，颇为壮观。河埠头拥挤起来了，有的洗木窗，有的揩器具，有的汰被褥……洗刷声伴着笑语声，小河也为之欢腾起来。墙门内的每一户人家，可见到男的挑水、女的打扫的场面，他们不但将自家打扫得窗明几净，也将墙门的天井、弄堂和角角落落打扫得一尘不染。整个墙门霎时变得焕然一新。

好不容易等到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小菜是如此丰盛，鸡肉、毛蚶、红烧肉、红烧鱼、辣茄酱、墨鱼、三鲜……足足挤满了一桌，小菜都有讲究，鱼意寓“年年有鱼”，年糕汤意寓“年年高”，三鲜表示“三羊开泰”，一家人边吃边笑，我和妹妹们个个吃得肚子滚圆，开心不已。

捉过年鱼

吉成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的冬天农闲时节，乡村里习惯淘池塘，既挖除淤泥，疏浚河流和池塘，增加蓄水量，利于排涝抗旱；又是一举两得地进行了“积肥”，挖上来的淤泥经冰冻日晒后，疏松无病害，而且肥分高，是极好的农家肥料。但淘河的工程量大，投入的劳力和时间多，不如淘池塘容易，只要互助组里几户农田在池塘周围的户主一合计就可实施，而且挖上来的淤泥肥田能省不少的运输人工。

淘池塘时，最欢呼雀跃的当数农家的那些“小人们”，他们希冀的是在“底朝天”的池塘里捉鱼虾，当时的那股“疯劲”，在许多年后的岁月里想起来都回味无穷。

那年腊月初，农田在池塘边上的五家大人们商定，趁这年旱冬池水浅，决定到年底疏浚这口塘，时间定在年底，当然有“捉过年鱼”的一层意思。

约定的日期在我们这批少儿的企盼中很快来到。天公作美久未下雨，但西北风却从头天下午开始刮起，拉得气温一路下降。次日天亮，顶着飕飕直往里钻的扑面寒风，有6位大人和5个小男孩组成的队伍，驮上竹制长柄泥夹、簸箕、砵糠、鱼篓、滑泥溜板和水车，人声鼎沸、浩浩荡荡地出村去了吞口。

到了目的地池塘边，在原岸水的旧址架设好了水车。这“水车”可不是后来的“离心式抽水机”，更不是现今的“潜水泵”，而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木制器具，外观是狭长的“U”型截面的木框，两端装设链轮，其上啮合着紧贴“U”字框底平动的几十节循环往复的链板，在出水口的链轮两侧都套着摆干。提水时，水车汲水端固定在两根河桩间的横担上，下沿入水，通过手握顶端有销轴的竹制摇杆来推拉摆杆，转动链轮，贴框底

平动的两片链板间拦带的水就被舀上岸来。岸水习惯上称为“车水”，通常是一人车水，但像那天追求应水速度时，一架水车就有两个人，每人手握一根摇杆，配合默契地一推一拉。在“咿咿呀呀”的水车声中，应上岸来的水流从出水口哗哗落地，汩汩地穿过水田流向通河口水沟。

这天的阳光始终未露脸，阴霾的天空朔风凛冽，先是有时无的雨丝随风飘洒到我们的脸上，继而不知不觉变成了冰雹子。往日黛色的远山显得雾蒙蒙的。但池塘边上见到的却是冰火两重天景象，已脱卸去外衣的大人们身着棉背心，内衣领敞开，衣袖都反卷到了肘上。我们这些儿童是现场高分贝音响的制造者，争先恐后地绕池奔跑和张望，不厌其烦地测量和预报着池水下落的新“战果”，见到鱼动的水花和身影，发出的大呼小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池水在午时见底，背鳍顶露出水面的鱼，时而缓缓游动，时而间歇，所有人的心都躁动起来，每架水车除一人留守以外，其余三个人脱去了外衣裤，在原着的短裤外准备再加套条短裤下池。爱开玩笑的李叔瞅见新婚不久的阿福哥穿的是花纹短裤，马上了劲：“大家看到没有，阿福新郎官穿的可是新娘子的花短裤呢！”不善言辞的阿福哥的面颊，瞬间臊红得如经西北风吹刮的树上的柿子，憨厚的他忙不迭地拎起鱼篓，在一片笑闹声中匆匆下入池中。

淤泥迅速埋没了跳入池中的人的膝盖，他们一边艰难地挪动，一边分别用双手为三架水车的汲水处开挖凹坑和从四处流向凹坑的引水沟。在我们小人的阵阵欢呼声中，一条条青灰色鳞片、手掌般宽的鲫鱼渐次被请进了鱼篓中，更令人惊喜的是阿福哥捉到了两条将近50厘米长的大乌鳢鱼（即黑鱼）。我们这些小人再也按捺不住，也迫不

本版配图 林绍灵 总第 5556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饭后，奶奶、父亲会给我们分压岁钱，嘱咐我们晚上睡觉时要把它压在枕下，等到初一才可以打开。我们会无数次猜想着红包里压岁钱的多少，盘算着以后如何使用，心里对这神秘的红包充满了热切的期待。然后，父亲叫我们轮流靠壁站好，测量我们的身高，并留下标记，当发现我们比去年长高了许多时，全家人都会发出由衷的笑声，我们自己也自豪不已。那一夜，大人们总是捧着火熄，嗑着瓜子，说着即将过去一年的收获，道着来年的希望，在守岁中度过。我们则跑来跑去凑热闹，当爆竹声稀疏了才肯去睡觉。

当新春的阳光透过窗户吻到脸上时，我睁开了眼睛——正月初一终于来临了！我们又大了一岁！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出门一看，老墙门早已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了，人人换了新装，个个神采飞扬，穿着最鲜艳的要数孩子们了，虽然是粗布棉袄，但那种鲜艳的红、绿、黄、紫、蓝，使昔日的泥孩子变得光彩照人。

咚咚锵！咚咚锵！一条威风凛凛的舞龙游过来了，身上套着鲜艳马灯的姑娘们走进来了，于是，一条蛟龙在墙门的每一条弄堂内摇头摆尾地游来游去，姑娘们像荡湖船般一摇一晃唱着马灯调，那充满祝福的歌词赢得了人们的一片叫好声。

初一刚过，老墙门就在迎来送往中忙乎开了，年轻的多手提“状元包”或“虎头包”出门去拜岁，年长的或留在家里的主妇们，喜欢把桌子搬到老墙门的天井里，边晒太阳边裹汤圆，当有客人跨进墙门，她们便热情地端起盛着汤圆的木盘，喜滋滋地回家煮汤圆去了。这时，老墙门内便飘出一缕缕香甜的气息。

那是一段多么幸福的时光啊，我实在想像不出还有什么节日能比得上春节如此隆重、如此热闹、如此让人魂牵梦萦的了。

及待地脱掉鞋袜、卷起裤管下池，我们不敢去池中央，就在塘边翻扯纠缠在一起的、枯黄的水草寻找猎物，当捕捉到潜在草堆下、趴在泥地上的一只只老虾公时，泥水触肤时的彻骨寒冷早丢到了九霄云外。

中午，各家的主妇们担来了用棉絮包裹的清一色的糯米饭、梅干菜烤肉的午饭菜以及一瓶高度白酒和遮雨的竹箬帽。岸上的人狼吞虎咽地进食，而在池中男人们则是挪到塘边，双腿陷在泥中，由各家的女人们喂食，阿福哥小夫妻俩又成了大家的“开心果”：“啧啧，你们看新娘子给新郎官吃东西的神态，多贴心，阿福真有福气。”笑声弥散在池塘四周，驱赶了人们的疲劳。

午后，水车结束了使命。各家的主妇们也加入了挖塘的队伍，所有人除了阿福哥继续在清塘、捉摸钻入泥中的鱼外，其余的人分为三组，两个组的人负责挖淤泥，用簸箕盛装了，经溜板流送上岸，倾倒在池边的水田里，另一个组的人则在池边上用泥夹挖取着淤泥，小孩子家也没有空闲过，为使淤泥易脱离簸箕，我们一次次往空簸箕里撒着糠。空中飘洒起纷纷扬扬的雪花，人们头上箬帽的黄褐色已变成了银白色，近山和远山渐次融入了一片白茫茫中。

看着受雪花糊、冰凌的覆盖而显得斑驳杂色的堆漫在田里的淤泥，人们沉浸在“多积肥，多打粮”的信念所鼓舞的喜悦中，使淘塘的人们热情高昂的，更有丰硕的副产品：乌鳢鱼、鲫鱼、河虾以及挖取淤泥中获得的数量可观的老黄泥鳅和黄鳝……

那年春节，淘池塘的我们几家人的餐桌上，都有了“红烧鲫鱼”、“油爆虾”、“泥鳅干”等佐酒的佳肴，而运气好，抓阉抓到了乌鳢鱼、鳢鱼的人家，则更添了“熏鱼”和“炒鳢丝”这两款佳肴的美味。



事情确实很不容乐观。没过多久，那位下令逮捕“四人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又下了令，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继续遵循。这一来就麻烦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是毛泽东决策的，于是什么也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文革”，不能否定造反，不能否定工宣队，不能否定废学，不能否定全国性的大批斗……谁否定，谁就被“清查”。我本人，也因为曾经随口说过一句“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而受到“清查”，而且和我爸爸十年前遇到的麻烦完全一样：这句话的主语是谁？那个原来与我们一起编过教材，后来转身以“石一歌”的笔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姓孙的人，成了“清查组负责人”。总之，仍然是一些“伪斗士”在忙碌。上海这种“清查”的惊人一笔，是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对“文革”。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觉得这未必是北京的决定，便壮着胆子不断给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写信，报告上海的情况，强烈要求否定文革。每星期都写一封寄出，这是我已故的叔叔给我的训练。我知道，每到邮筒投寄一封信，都可能是返回到自己身上的炸弹。但我，已经不怕。

幸好，1978年12月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叫“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终于被否定。会议还宣布，中国要解放思想，停止阶级斗争，着力经济建设，开始改革开放。会后没几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组”全部都解散了。那一批“伪斗士”，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找不到了。

半年后，我应邀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盛大，绝大多数文化名人都参加了。很多老人见了我都会说一句：“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勇敢！”不知他们听说的是哪一段。我是这个会议最年轻的代表，在总结大会上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这年我33岁。

坐长江轮回上海，我在甲板上看着橙黄色的江水作出决定，不赶“秘书长”之类的热闹了，还是返回安静，埋头继续奉化半山老楼的读书计划。那时读的是中国古籍，现在有了开放势头，应该增读世界人文经典，为自己补课，也为中国补课。

从庐山回到上海，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好像上海人事部门的一个科长找过我，留下了地址、电话，和一个潦潦草草的“齐”字。

人事部门找我会有什么事？我两次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他写的地址找到了高安路的一个门牌号，伸手敲门。

门开了，我眼前站着一个瘦精精的人，但是，那间房子西窗的阳光直射开来，使他成了逆光中的剪影，我看不

清他的脸。他亲热地叫了我的名字，并侧过身来。这下我看清了，却又僵住了：他竟然是农场里人人讨厌的齐营副！

我敢说，农场难友们对齐营副的讨厌，一定达到了最高等级。那个漫长的苦难岁月是从他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又要我们脱裤子割尾巴开始的，而又结束在他对美丽的造反派女学生的审查上。很多男同学都下决心要找机会打他一顿，为此宁肯接受任何处分，可惜很快就离开了，没打成。他，他怎么钻到了上海，还在人事部门当科长？

我想夺门而去，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我也讨厌自己。坐下听我说几句吧，听不下去你再走。”听他这么说，我看了他一下，却看到了一种非常诚恳的眼光。眼光很难骗人，稍有伪善也能立即发现，但他今天的眼光里没有。我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先说公事。你前两年写到北京中央办公厅的很多信，都转回到了上海，这几个月才由我们部门接收。几位同事看了，都对你非常佩服。你已经看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和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车文仪都已经去职。”

“那没用。”我没好气地说，“一场灾难的责任，已经搞乱。中央的事我们管不着，我只问民间：我叔叔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严风英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老舍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把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我怎么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变得似乎人人有份又人人没有责任？”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